许德珩传

——杰出的爱国政治活动家

一 投身革命

许德珩，出生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历经4个时代——清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国民党政府时期、新中国时期。他是一位杰出的爱国政治活动家、九三学社卓越的创始人和领导人。在教学和科研战线上，他也是一位贡献卓著的社会学家。

江西九江，山明水秀，鱼肥稻香，人文荟萃。九江有座庐山，我国晋代著名文学家、田园诗人陶渊明就出生在庐山脚下，而许德珩也是在庐山脚下沈家冲出生的。

许德珩生于1890年10月17日。他原名许础，因兄弟辈中通用“德”字，故名德珩，表字楚僧，后来将楚僧改为楚生。

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声，曾参加太平军的革命运动，后来做了太平天国的一名军帅。1855年，许振声在太平军进攻湖北的一次战役中阵亡，受到天朝的追封。湖北战役之后，清廷追查许振声的家族，由于同乡人的保护，虚报“人丁散尽，家产尽绝”而结案。全家就从德化县（1914年改为九江县）的花果园村潜逃到离县城20里以外的仁贵乡沈家冲，隐居起来。为此，许德珩的祖父不敢进取功名，以行医为业。到了他父亲许鸿胪的时候，清朝国势日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追查太平军家属的事已渐渐松弛。许鸿胪才参加府试，并且中了案首(即府试第一名),以后又补为廪生,后来被人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旧时官府中草拟文稿和管理档案的人员）。1907 年因同情徐锡麟、秋瑾革命烈士被罢职，遂回到九江，在同文书院任教。

许德珩6岁随长兄在家馆里读四书五经。后来，新式学堂的课程吸引着他,使他下决心要学英文、数学。从16岁起,他就到县城里一位同文书院的毕业生那里学英文和数学。每日步行往返40华里，风雨无阻，从无间断。1907年，许德珩终于如愿以偿，考进了九江中学堂。

许德珩生长之时，正当光绪亲政，锐意变法之秋，而变法维新思想经过一二十年的激荡，亦蔚然成潮。许鸿胪同情革命，自得风气之先。戊戌变法演成戊戌政变，以悲剧收场。但维新思想对许家的影响，一直是深远的。许鸿胪从绍兴带回了一些介绍维新思想和进化论思想的书籍,如《新民丛报》、《革命军》以及《訄书》、《天演论》等等，年少的许德珩在旧学的基础上很快就吸收了这些进步思想和西方学说。

九江中学堂里有两位曾经留学日本的教师，都是同盟会员，经他们介绍，许德珩也加入了同盟会，并且剪了辫子，以示革命之坚决。剪辫子在当时是犯忌的，所以有时许德珩不得不戴上一条假辫子和一顶瓜皮小帽以掩饰。

正当许德珩在九江中学堂读书的时候，辛亥革命爆发了。武昌首义之后，紧接着九江光复，都督为北洋系统的马毓宝，总参谋长为李烈钧，宪兵团司令为廖伯琅。不久，李烈钧推翻了马毓宝，自任九江都督。随后，在孙中山先生的任命下，李烈钧升为江西都督兼任九江都督。

21岁的许德珩在九江光复之后，毅然放弃学业，到廖伯琅的

宪兵团从军。李烈钧成立秘书处时，经廖伯琅推荐，许德珩在秘书处任秘书。

许德珩在李烈钧部任职期间，曾听过孙中山的讲演。那是1912年10月，李烈钧邀请孙中山来江西视察，在九江，孙中山在欢迎会上演说。孙中山没有“带有巨款回国”，“不名一钱”，但带回了“革命之精神”的名言，许德珩就是在这次会上亲自听到的，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次，李烈钧处决了一名打错旗语的部下，许德珩认为量刑过重，罪不当死，一气之下离开了部队，又回到九江中学堂继续读书。

1913年7月，在各地纷纷讨伐袁世凯的义旗激励下，许德珩反袁的义愤按捺不住了，二次又来到李烈钧部参加了湖口讨袁战役。不久战局失利，李烈钧逃亡日本，许德珩在九江也呆不下去了，就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去读书。

二 投考北京大学

中国公学虽然号称公立，但学费较高，许德珩读了一年半的书，无力继续下去，只好中途辍学。听说北京大学读书比中国公学花费要少，他遂于1915年暑假来到北京，考入了北京大学英文学门。

许德珩进入北京大学时，正是在蔡元培任校长之前。当时北大，不是一个研究学术的机构，而是一个谋求升官发财的阶梯。学生对于教员，不问其学问之深浅，惟问其官阶之大小；他们平时放荡冶游，考试照抄讲义；不要真才，实学，只要分数文凭。

1917年1月，致力于教育改革的蔡元培来到北京大学担任校

长。奔波半生的蔡元培，终于有了一个能够一抒所怀和实践自己抱负的天地。他满怀信心，要按照西方教育的面貌来改造北京大学。

蔡元培要求学生“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又要求学生“砥砺德行”；“以正当之娱乐，易不正当之娱乐”。三是“敬爱师友”；“同处此校，毁誉共之”。在招生方面，蔡元培坚持以考试成绩录取学生。因此，有一些出身贫苦的青年，能够进入北京大学学习。

办好学校，必须要有好教员，尤其要选好学科带头人。蔡元培的原则是“兼容并包”“思想自由”。他实行“人才主义”，用人打破“年龄”“资格”的限制。他不求全责备，网罗的各家也就能各显所长。

对于不学无术的教员，蔡元培并不包容，即使洋教员，也在辞退之列。在辞退的本国教员中，有一位文科教员，品行不端，生活作风败坏，许德珩与另外6名同学提议驱逐这个教员离开北大。在蔡元培校长的支持下，终于把他赶出了学校。

在蔡元培的学术自由号召下，师生组成的各种学术研究会、社团，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了。许德珩就参加过新闻学会，听过李大钊和邵飘萍的多次讲演。

为了转变腐败的校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组织“进德会”，主张不赌、不嫖、不娶妾、不作官吏、不作议员等，以和封建道德对抗，他的目的在“养成学问家之人格”。蔡元培、李大钊都是会员。学生中朱自清、许德珩、潘家洵等也都入了会。

1916年春，许德珩因父亲去世，同他结婚仅4年的妻子陈夫人又相继病故，不得不返回家乡料理后事，中途辍学。1916年秋，他回校复学时，转到国文学门重读一年级。当蔡校长到校任职时，他

正是国文学门一年级的学生。

尽管在北大读书花的钱要比在中国公学少得多，但许德珩的生活仍然维持不下去。幸有家乡一位同学资助，才勉强解决困难。不过他仍然过着清贫的生活。在寒冷的冬天，他总是一件夹衣御寒，经常在课堂或图书馆里读书，藉以烤火取暖。他住不起学校的宿舍，与另外一位同学合伙租了一间民房，每月分摊房租一元五角。他无力在饭堂包伙，而在街上小饭铺里吃些面条烧饼之类的廉价食品充饥。一年之后，他搬进了学校的西斋宿舍，可是一日三餐还是要到外面小饭铺里去吃。

正在经济拮据，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人告诉许德珩：蔡校长爱护人才，提携后学，向他求援或许可能帮助解决生活困难。一天上午，在校长办公室里许德珩向校长陈述了自己的情况，希望能给以半工半读的机会。蔡元培拿出一本英译本《多桑蒙古史》，叫他当场翻译一章。时近中午，许德珩翻译完毕交了卷。蔡元培看了比较满意，当下就介绍许德珩到国史编纂处纂辑屠寄那里，课余翻译《多桑蒙古史》，每月致酬10元。这对一个贫苦学生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从此许德珩解决了温饱问题，稳定了读书生活。

三“公府”请愿

1917年11月7日，北京香山的红叶已纷纷落地了。正是落叶惊秋的季节，北方的邻国传来一声炮响，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俄国十月革命，在人类发展史上，有着划时代的伟大意义。它使世界分裂为两大对立的体系，给世界资本主义带来一个永远不能恢复的致命伤。

1918年5月16日中日两国签订了《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定》。日本签订协定的目的，一方面是干涉十月革命，同时也是为了借此进一步控制中国，特别是为了巩固其在北满的统治。段祺瑞政府签订这个协定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投靠日本，以便维持自己的反动统治。

这一协定，受到了中国学生的坚决反对。还在1918年4月间，中国留日学生即获得这一秘密消息，立即集合和散发传单，反对这一协定，5月上旬并议定组织救国团。他们的活动竟遭到日本警察的干涉和侮辱，这就更激起了学生们的义愤，决定一律罢学回国。

据当年5 月17日报载，留日学生回国仅至上海者即达1400 余人。如李鹤鸣（李达）、李汉俊、黄日葵等，就是这次回国的。李鹤鸣、王希天、阮湘、龚德柏回国后，曾到北京和北大的学生代表邓康（中夏）、许德珩、张国 焘等联系，痛陈在东京受辱的情形，引起北京广大学生的同情。黄日葵回国后，也到了北京大学作旁听生。

5月 19日，北京《大中华报》揭载了这一协定的内容，次日各报也纷纷转载。5月20日晚，北大学生在西斋饭厅召开群众大会，大家义愤填膺，要求政府废除卖国协定，并定于次日去总统府请愿。

许德珩参加了5月21日上午的总统府请愿。前往新华门总统府请愿时，学生的情绪十分激昂，有一学生曾断左手中指血书：“案件取消之日，为我辈生还之时。”当时总统冯国璋被迫接见了学生代表，用花言巧语欺骗学生。学生们缺乏政治斗争经验，听信了冯的谎言，受了骗，第二天便宣告复课。这次斗争没有取得什么结果。

四　积极参加社团活动

到公府请愿虽然没有结果，运动仍然是有成绩的。通过这次

运动，北京和天津的学生组织起来了，北京一部分学生组织了学生救国会。邓康、许德珩、黄日葵、易克嶷以及张国焘等都是学生救国会的组织者和负责人。

当时，有的学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以为“爱国”是落后的思想，因而又改爱国会为救国会[①]。

1918年暑假，学生救国会派出许德珩、易克嶷为代表，南下天津、济南、武汉、九江、上海等地进行联络。

许德珩、易克嶷在天津受到了天津学生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因为那里的学生也已经组织起来了。他们会见了马骏、郭隆贞、谌志笃、马千里、张传琦、张泰来(后改名张太雷)等人。

他们在济南、武汉、九江、南京等地，会见了许多学生中的先进分子。在武汉，他们会见了恽代英。许德珩和他一见如故，因为彼此都是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又经北大同学刘仁静的介绍，所以感到格外亲切。

许德珩、易克嶷最后到达上海。这时，上海的学生也组织起来了，7月的一天，他们在龙华体育场召开大会，许德珩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报告了学生运动的情况，各校学生有几千人参加，还有工商界各方面代表参加。

许德珩、易克嶷在上海会见了妇女界各方面的代表，还看望了孙中山以及吴稚晖、廖仲恺、朱执信、邵力子、叶楚伧等，也与新闻界、商界人士进行了接触。他们于9月初回到北京。由于他们积极联络，学生救国会不仅几乎成为全国性的团体，而且得到各方面的同情和支持。

1919年春，北大学生会成立，学校中救国会成员全部参加了

① 许德珩：《杂谈五四》，《五四运动回忆录》，中华书局1959年版，

学生会。为了便于展开活动，学生救国会决定成立国民社，出版《国民》杂志。据许德珩回忆：国民社在北京北池子骑河楼路南一所房子里租了一大间房子，通讯、开会、讨论问题都在那里。国民社社员曾达1180多人。

国民社于1918年10月20日正式成立，《国民》创刊于1919年1月。国民社在成立启事中说：“本杂志由学界同志组织而成，抱定左列四大宗旨（一）增进国民人格（二）灌输国民常识（三）研究学术（四）提倡国货。”①

许德珩是国民社早期活动中一位起积极作用的人物。《国民》创刊号上，许德珩写了代发刊词，题为《吾所望于今后之国民者》，内容从感受、耻辱、痛惜、知耻、力行、勤奋、毅力七个方面，阐述《国民》的宗旨。许德珩等还约杨昌济（怀中）、黄侃等北大名教授为《国民》写稿。许德珩实际上担负这个刊物的主编工作，每一期都有他的文章发表，而且不止一篇，有的用其本名，有的署名“楚僧”。

李大钊在学生界受到相当高的尊敬，国民社有事都和他商量，他积极为《国民》撰稿并给以热情帮助和指导。

《国民》对五·四爱国运动的兴起，起了很大的作用。它的大多数成员在五·四运动中都成为积极的参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而许德珩的贡献尤为卓著。

《国民》创刊不久，许德珩与邓康等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宗旨是：“增进平民知识，唤起平民之自觉心。”团员有三四十人，于1919年3月成立。讲演团在五·四运动中有了很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12月1日。

许德珩还参加了王光祈、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的少年中国学会。它是一个带学术性的进步政治团体。其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文化运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少年中国成立之初，许德珩担任该会编辑部临时编译员，后来在留法期间，还为该会出版的《少年中国》翻译涂尔干所著的《社会分工论》，逐期连载。

各种社团的出现，实际上为五·四爱国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对许德珩来说，参加几个社团的活动使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受到了锻炼。

五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五　四前夕新旧思潮的激战，已预示着一场革命的暴风雨不可避免，而恰好在这时，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上的失败，这场斗争于是一触即发。

1919年5月1日，当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开时，中国人民积聚已久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5月2日，蔡元培在北京大学饭厅召集学生班长和代表一百余人开会，他讲述了巴黎和会上帝国主义互相勾结、牺牲中国主权的情况，指出这是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号召大家奋起救国。[①] 3日，蔡元培从徐世昌政府外交委员会委员长汪大燮处得知[②]，钱能训内阁已密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令其在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蔡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坚持反日立场的《国民》杂志社的北大学生许德珩以及北大《新潮社》的傅斯年、罗家伦、康白情、段锡朋等。许德珩当即约集在北

① 何思源：《五四运动的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② 1918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职，在怀仁堂与冯国璋举行交接典礼。12月20日，钱能训被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

大《国民》杂志社内的各校学生代表,在北大西斋集会商讨对策,决定就在3日晚上在北大三院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

3日晚上,会议如时召开,由北大法科学生廖书仓任主席,文科学生黄日葵、孟寿椿任记录，许德珩负责起草宣言。张国焘、许德珩等都在会上讲了话，个个慷慨激昂，声泪俱下，气氛十分悲壮。一致作出如下决定：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和约上不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

(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在会上还有人提议：“留日学生可以那么对付章宗祥①，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对他们三个(指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来一下？就是说，要把旗子送到他们的家里去。”② 立即得到了一致的赞同。

会后，许德珩连夜起草了《北京学生界宣言》。

5月4日上午10时，北大和各校学生代表开会，商讨去天安门集会和示威游行路线。下午，北大的队伍虽在临出发前受到教育部代表及军警的阻止，学生代表邓康、黄日葵与之辩论多时，最后仍然浩浩荡荡走出学校，向天安门行进。下午1点多钟,十几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队伍3000多人,挥舞白色小旗,高举标语牌,在天安门前汇齐。同学们有讲演的，有呼口号的，激昂慷慨，声急情切，纷纷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学生们推举北大学生代表宣读并通过了许德珩起草的《北京学生界宣言》。《宣言》全文如下：

① 指《每周评论》报道章由日回国时，群众愤激用小旗子投掷章的状况。

② 杨晦：《五四运动与北京大学》。《五四运动回忆录》上,第223页，

鸣呼国民！我最亲、最爱、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忍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祈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企，所庆祝者，岂不日世界上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侪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中，实南北之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撒、劳连两州也，日："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日："不独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大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二十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讲，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图之①。

在这次集会中，许德珩和其他北大学生朱自清、孙伏园、杨振

① 《时报》，1919年5月6日。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声都是当时的积极分子，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

会后，开始示威游行，沿途散发了题为《北京全体学界通告》的传单(《通告》是由罗家伦起草的——编者注)。

当游行队伍通过美国兵营时，为外国守卫军警所阻，不准通过。学生们到美国使馆投递了英文《说帖》，表达了中国人民反对侵略、誓死收回山东权益的决心，同时希望美国等国给以“同情之援助”，反映出对欧美帝国主义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六　火烧赵家楼

被阻于东交民巷西口的3000多名青年学生，在烈日下整整晒了两个小时，“虽无厌倦之容，难免忿恨之态。”① 学生们深深感到“国犹未亡，自家土地已不许我通行，果至亡后，屈辱痛苦，又将何如？”学生们也意识到“使馆界之不许通过，各使之不亲见，乃事前警厅有电话知照。”② 此时此景，怎能不使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义愤填膺、怒发冲冠呢？正如匡互生在回忆中所说“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愤激起来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真个响彻云霄。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③

学生们在向曹宅进发的时候，沿途又散发了许多传单，其中一张写道“民贼不容存，诛夷曹章陆”；“泣告我同胞，患莫留心腹。”④

① 蔡晓舟、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54页。

② 《青岛潮》。《五四爱国运动》上，第167—168页。

③ 匡互生：《五四运动纪实》，《五四爱国运动回忆录》上，第307页。

④ 《中国青年》，1959年第7页。

当日中午，曹汝霖正应徐世昌之约，为刚从日本回来的章宗祥洗尘。在座有钱能训、陆宗舆等。当学生游行的消息传来时，有人劝告曹等‘暂留公府(总统府简称),不要出府回家，’但他们认为赤手空拳的学生是可以对付得了的。席间，徐世昌对钱能训（国务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即警察总监吴炳湘)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①

下午3时许，曹、章回到曹宅，吴炳湘加派了三四十名警察来曹宅守卫。4时许，游行的学生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到了前赵家楼胡同的曹宅门前。北京高等师范学生匡日休首先破窗而入，撬开大门，群众遂大举涌入，把曹家什物捣毁甚多。学生的目标集中于曹汝霖，对其家人仍以礼相待。

愤怒的群众遍觅曹汝霖不得，却发现了匿身曹宅的章宗祥，狠狠揍了他一顿。曹汝霖本人却因躲入一厢房中而幸免挨打。愤怒的学生冲入曹宅，将曹汝霖的汽车捣毁，取了几桶汽油，又将房屋烧着。吴炳湘随即赶到，下令拿人，学生被捕者达30余人②。

其实，当时被捕学生共32人，其中北大20人，许德珩在被捕名单中居首位。另有高师8名，高等工业学校2名，中国大学1名，汇文大学1名。

被捕学生受到警厅的公开侮辱和残酷迫害。许德珩和易克嶷被捕后，被捆在拉猪的手推板车上，拉进前门户部街的步军统领衙门。被抓来的学生都被放在站笼里蹲了几个钟头。第二天,他们又被移送到京师警察厅。32人住在一个大房间里，谈话不能自由，便溺皆受限制，室内放着两个大尿桶，空气非常恶浊，备尝苦辛。在警察厅许德珩等一个一个地被传讯，时间长短不同，但被追问

①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杂志社版，第152页。

②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版，第153页。

的问题是：谁是指使人？而被审问者都回答说：自己就是自己的指使人①。

被捕的32名学生在监禁中的表现，都是很坚强的。

在广大爱国师生坚决斗争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 5月6日，当蔡元培到警厅以身家作保要求释放学生时，反动当局不得不勉强同意。7日上午，当人们去迎接的时候，许德珩等被捕的学生认为‘我学生多拘一天，则国民多一次刺激，甚至我三十二人被杀，其刺激甚大，坚不肯出。’后来‘经同学再三劝慰，始各返校。”②蔡元培和北京大学的全体学生，在汉花园文科新校舍（即红楼），迎接了被捕的北大同学许德珩等返校。是日，各校同时复课，至此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发展，进一步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的学生都组织起来，在北大的发起下， 5月6日成立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北大代表黄日葵、许德珩、段锡朋等与其他各校代表经常出席学联的会议，商讨爱国运动进行事宜。

被捕学生虽被释放，但反动派并不就此善罢干休。北京政府中的死硬派主张严厉镇压学生。曹汝霖竟以学生烧房、打人向法院起诉，要求赔偿损失，而京师地方审判厅也竟然就在释放学生的同时，悍然宣称：业经释放之学生将送交法院讯力，并于5月9日发出传票。以许德珩为代表的北大20名被捕学生，也发表了‘声明状”，强烈抗议警厅的非法传讯③。

由于北京大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五·四示威游行的发动者，“于是北京学生一万五千人所为之事，乃加罪于北大之一

① 孙伏园：《回忆五四当年》，《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

② 《释放学生之经过》，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5月10日。

③ 《北大被捕学生声明状》，《教育潮》第1卷2号。

校,北大一校之罪加之于蔡校长之一身。”①

在这种形势下，蔡元培于被捕学生获释之后，便向北京政府提出辞呈。5月9日晨，蔡元培秘密出京，行前给北大师生留下了“杀君马者道旁儿也”的辞职启事。他的辞职更赢得了广大师生的尊敬和同情。

5月18日，各校五千多学生在北大法科礼堂，召开了郭钦光追悼大会。郭钦光系北京大学文预科学生，带病参加五四游行，被军警殴伤、吐血，伤重身死，是五四运动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人。许德珩以北大学生代表身份在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他说：“今日追悼郭君，实无异追悼我们自己。因郭君未了之事业，全凭我们继行其志，做到他现在的地位，方肯罢休。”②

对郭钦光的追悼，事实上成了一次5月19日总罢课的动员誓师大会。

北京学联会成立后，极大地加强了爱国斗争的领导。5月19日，为了进一步打击反动势力，学联会决定自即日起，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一律罢课，直到学生的要求得到满足为止。

七　南下扩大影响

北京学联会成立不久，就决定派代表黄日葵、许德珩到南方各地去扩大宣传。当时正值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罢课，北大三院被军警层层包围。他们于5月27日从三院跳墙出来,化装出京。

黄日葵、许德珩沿津浦线,到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他们在天津和张泰来（即张太雷）等进行了交谈，商讨了如何一致行动的问

① 蔡晓丹、杨景工：《五四》,《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60页。

② 《五四爱国运动》下，第256页。

题。张国焘在回忆中也说：“北京学生联合会曾先后派出几批代表，分向各地进行组织全国学联的活动。北京学生代表许德珩、黄日葵等人最先到达上海。段锡朋等也在全国学联成立之前赶到。”①

5月31日，上海男女学生1万多人，在西门外体育场召开了追悼郭钦光的大会。许德珩以北大学生名义在大会上发表演说，激昂沉痛。大意是：“我于27日出京时，学校四周密布军警，干涉行动。易敝服，化装潜行，始得今日与诸君参与此会，可谓幸事。人皆有死，为什么要追悼郭君呢？就因为他的牺牲精神和坚强毅力，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我们也应该用此精神和毅力，去达到郭君争取的取消密约、收回青岛、惩办国贼的目的。如果我们达不到这个目的，郭君地下有知，就要为我们追悼了。”

当时出版的《上海罢市救亡史》对许德珩的演说有如下的报道：“许君言词沉痛，闻者为之泣下。当由何会长(何葆仁)告诉大众，谓许君系北京大学学生被拘32人中之一人。会众闻知，群为鼓掌，表示敬意。”

会后，整队游行至南市，学生们举着校旗和挽联，沿途唱歌曲、呼口号，声威甚壮②。

上海追悼郭钦光的大会，事实上成为上海学生投入六·三运动的一次动员大会。

从6月5日开始，上海的三罢(罢工、罢市、罢课)斗争实现了。

5日下午，上海各界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实际上，工界代表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会议讨论了运动的目标问题。讨论的结果，会议认为目标应集中在惩办卖国贼上，并表示，此目标不达到，即不应该开市。

①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第60页。

② 《申报》，1919年6月1日

许德珩作为北京学生代表在会上介绍了北京学生斗争的经验和决心，还提出了“国民自决”的口号，他说“国民自决”四字，吾人心目中所恒有，望政府惩卖国贼，恐不可得也。”①

会议之后，学界、商界一直在罢课、罢市，曹、陆、章被罢免消息证实后，才于6月10日胜利开市。

6月16日，全国学联成立大会在上海召开，到会有各地代表50余人，还有来宾和外宾参加。

作为北京学生代表的许德珩在会上强调：“我辈宜去虚荣心而牢守坚忍心。”发表演说的还有其他学生代表和来宾②。

6月18日，全国学联召开选举职员会。北京代表段锡朋当选正会长，上海代表何葆仁当选副会长，北京代表陈钧当选评议长。许德珩被任命为《全国学联日刊》主编。

6月28日，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严厉督责下，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开始提出的惩办曹、陆、章和拒签和约这两个具体斗争目标，取得了胜利，运动已告一段落。

蔡元培于5月21日由上海到杭州。全国学联成立后，段锡朋、许德珩代表全国学联从上海到杭州西湖杨庄③谒见蔡元培，请求他打消辞意。蔡元培鉴于校内外各方面的敦促，同时北京政府已经让步，学生斗争取得了胜利，遂于7月9日致电学界有关团体，表示放弃辞职，希望学生致力于求学。这时蔡元培因旧病复发，同日致教育部电答应复职，要求“宽以时日”；“一经就愈，即当束装

① 《申报》，1919年6月6日。

② 《申报》，1919年6月17日。

③ 根据汤尔和1919年6月29日日记（胡适手抄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胡适档案919号。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